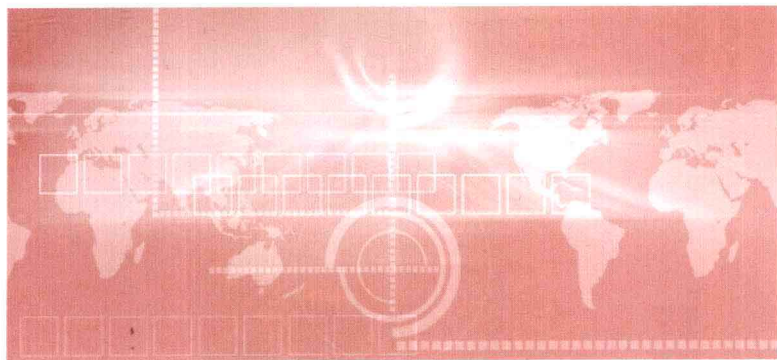


◇靳书君 著



全球化、现代化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Quanqiuhua xiandaihua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hudong guanxi

 人 民 出 版 社

全球化、现代化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Quanqiu hua xiandai hua yu
ma ke si zhu yi zhong guo hua de hu dong guan xi

◇ 靳书君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姚 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靳书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01-011577-1

I. ①全… II. ①靳…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905 号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QUANQIUHUA XIANDAIHUA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HUDONG GUANXI

靳书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1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577-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言	(1)
一、国内研究现状和走势	(1)
二、西方研究概况及学术范式转换	(8)
三、现实、理论和学术意义	(20)
四、篇章结构	(22)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2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25)
一、一个科学命题	(26)
二、两项伟大实践	(27)
三、三条实现途径	(29)
四、四种发展形式	(3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	(34)
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34)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	(3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4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19 - 1948)	(45)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和探索(1948 - 1978)	(51)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9 -)	(54)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全球化的历史性贡献	(61)
第一节 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共生与形塑	(62)
一、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	(63)

二、世界历史发展物质性和能动性的相反相成表现为全球化和民族化	(6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融入全球化的理论建设工程	(70)
第二节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依附性问题	(72)
一、全球资源配置不均衡	(73)
二、全球劳资关系不对称	(77)
三、全球公共治理不公正	(80)
第三节 从全球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83)
一、实现主题的中国化,促使负面的全球化转换成正面的全球化	(86)
二、实现主力的中国化,推动自在的全球化转换成自为的全球化	(90)
三、实现主体的中国化,引导单向的全球化转换成双向的全球化	(94)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101)
第一节 现代化与中国化的交汇与提升	(102)
一、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交叉与汇合	(103)
二、现代化对中国化的提高与升华	(105)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代化的理论建设工程	(109)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问题	(113)
一、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基础,造成发展内涵的片面性	(115)
二、社会内部活力支撑不足,引起发展动力的外生性	(118)
三、传统国家政治权威衰落,导致发展战略的被动性	(121)
第三节 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124)
一、通过主题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片面到全面的历史性超越	(127)
二、通过主力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外生到内生的历史性超越	(134)
三、通过主体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超越	(139)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启示	(145)
第一节 从理论品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	(146)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学自觉	(147)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的解释学透视	(150)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的解释学分析	(155)
第二节 从现实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视阈	(160)
一、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162)
二、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	(164)
三、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167)
第三节 从主体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性	(170)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化和主体化的统一	(170)
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	(173)
三、科学国情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性	(175)
四、科学方法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性	(178)
结 论	(181)
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200)

引 言

在全球化时代寻求一条中国化道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视野。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现代化,一直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如何处理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关系,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面向世界参与全球化的需要,又是立足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追求。本书的目的就是从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互动关系出发,观照和检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理论建设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导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历史性提升。

有论者认为,西方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早于中国,笔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如张如心、和培元、杨松、王实味等,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笔者认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国内注重学术范式。下面分别就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

一、国内研究现状和走势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逐渐突破了“潜学科”背景下“板块式”的研究方法,开始注重研究的整体性。2004年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从分体式研究向整体性研究的转向。之后,肖贵清提出:“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性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

究,有别于以往那种对各个理论成果的‘板块式’研究。”^①赵存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研究的学科依据和基本要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将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又是一个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只有坚持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一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过程,并将其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继续推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性使然。”^②赵麟斌对这一本性做了学理分析,他借用马克思的“具体总体”思想,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体总体”概念,应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③杨谦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结构:“从理论看,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从实践上看,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统一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复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中。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决定了它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共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④随着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各个不同的方面将分别被提到首要位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涌现不同的代表人物,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但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理论范畴的目的性并没有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具有共享的要素、共有的机理和共同的规律。赵存生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发展过程、重大理论成果、相结合的机理以及对理论、实践及其主体的中国化问题等四个方面要有整体性认识。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姜新立、李英明等学者

①肖贵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教学的几个问题》,《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基本思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赵存生:《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

③赵麟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韩国学者宋荣培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与“具体的全体”,即“历史的一社会的”关联相隔绝。参见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④杨谦、代俊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整体性特征》,《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

运用“后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的二元分析架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姜新立在《大转变:后共产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研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可套用孔恩(T. Kuhn)的理论,视此为一种“典范转移”的过程。李英明在《中国大陆研究》中称:“当毛泽东于延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可说中共便已开启了后社会主义的道路。”“后”者,解构之后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分析架构不宜苟同,其学术价值在于提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整体性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一大批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著。据统计,2000年至今,国内出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名的专著近五十部,公开发表题目中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字样的论文五百多篇。这些研究的问题谱系囊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素、内涵、背景、条件、历程、成果、逻辑、机制、经验、规律诸多方面。

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重要特点,代表着学术范式的发展水平。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乏神来之笔,但整体性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距离成熟的学术范式仍有一段路要走,尚未形成学界共同认可的公理化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这不是因为整体性研究力度、广度、精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基础性研究薄弱,虽然“概论式”、“史纲式”的定点研究、个案研究洋洋大观,但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微观研究仍嫌不足。张静教授指出:“现在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扎扎实实地做好大量基础性工作,为更好地开展整体性研究创造条件。”^①可喜的是,学术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基础性研究。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先后编写《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两部文集,2007年井冈山干部学院主办“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集学人之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具体个案进行专题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社开展“一人、一事、一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案研究,吸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基础性研究。一些学者也对人物、事件、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研究,努力添补基础性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对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研究,对五四运动、三湾改编、八七会议、秋收起义、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延安整

^①《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研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静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8期。

风、六届六中全会、八大、十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还有学者对《矛盾论》、《实践论》、《论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江泽民文选》、胡锦涛“七一讲话”等文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研究。另外,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关于马克思经典学说中国化的分科研究,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教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研究,经济学领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第三配置思想、所有制理论的中国化,陈承明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化》。

整体性研究离不开基础性研究做铺垫,基础性研究必须具有整体性研究的宏观视野,二者统一的基础在于准确的学术定位。有学者指出:“在热闹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其中尤以给研究具体定位最显。”^①2002年尹保云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一文,分析了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国内学者之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重大分歧,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我们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个长程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置于这个视野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之后,何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被提升为研究对象,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了出来,进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以往的狭隘的概念研究,转向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问题和思想史的研究,即真正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总体加以探讨,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其理论形态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而且要揭示每一个理论所包含的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内容”^②。邹诗鹏提出:“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③赵士发认为,只有从现代化的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并对马克

①侯且岸:《“西方文明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之一》,《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

②何萍:《开展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③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给以合理的说明。现代化视野作为整体论眼光和过程论眼光的综合,实际上是一种世界历史眼光。^① 这些论著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定位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运动,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现代化启动、推进、跨越所面对的特殊难题,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思想指导原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国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不能远离国内外的近现代思想运动,不能停留于抽象概念领域做演绎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不是单纯为意识形态“正名”、“正统”,去写一些“注经式”、“填鸭式”的论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就是研究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寻求一条中国化道路实现现代化。

尽管中国化的思潮和探索从来就是在与全球化、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曲折发展的,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却始于二十年前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的研究,罗荣渠明确提出要从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视野研究中国化问题。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建立及研究热潮的出现,开始有较多的学者论及这一问题。高放、邹诗鹏等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近代中国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西式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使之成为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② 中国遭遇的现代性是整体性的,不可能是单独孤立的某个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现代性的整体认同。^③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创新,超越了近代以来八次资本主义后发外生型、被动的现代化,变被动为主动,开创了内生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④ 刘秀萍《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一书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面对“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问题,为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难题,对中国

①赵士发:《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张兴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视野》,《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④高放:《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全球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后发展”问题的整体设计,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全球化、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提升。任平看到,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代表的中国化主张,都是资本全球化不同阶段对中国发生影响的产物,也是中国本土对变化着的资本全球化反应方式的演变,应答的逻辑与挑战的逻辑是完全对应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全球化侵入中国的过程存在三步愈益深入的挑战,造成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激起中国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正面嫁接。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化影响发生改变,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以战争相排斥,而且极力压制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代替了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再也无力成为真正的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却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成为在新的资本全球化阶段与之对话,从而拯救中国的领导力量。于是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① 余金成指出,昔日物流主导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落后国家实际的结合提供了机遇,物流秩序的紊乱呼唤的是国家掌控,出现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今时代信息流主导的全球化取代了物流主导的全球化,信息流的紊乱呼唤的可能是民主自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成果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从“人化的物”转到“智化的人”,修正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解放的原始设计,即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增加财富—人的自由发展—实现理想的社会关系,调整为市场竞争—增加财富—人的能力发展—财富充分涌流—人的自由发展—实现理想的社会关系。^② 邹诗鹏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启蒙意义。初步的启蒙表现为群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把笼统的群体意识转化为积极的共同体意识,政党的先进性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通过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现了初步的民族自觉。深度的启蒙面向现代性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这种观念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

①任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

②余金成:《全球化视角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论纲》,《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物化特征,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的观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确立了以建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①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关系做了初步厘定。刘德喜探讨了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紧密关联: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片面性弊端、使全球化朝着健康合理方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指导着全球化的实践,主要是指导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前中国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与自主,但在苏联模式影响下脱离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难以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动力,结果是在现代经济文化方面的落伍。直到1977年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从全球战略来考虑”。^②俞可平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下,如何处理‘中国化’和‘西方化’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而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③平飞指出:三个“化”本质上都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矛盾运动过程、一个整合创新过程、一个主体完善过程。现代化、全球化、中国化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中国特色”就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基线主线,以世界文明的中国化和中国文明的全球化为内外两翼,实现文化中国从自在向自为不断超越,从而创造中国独特理论、独特模式、独特个性、独特面貌、独特文明的独特之点。^④这方面的成果为本书准备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是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在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是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性、现代性问题,使全球化、现代化朝着健康合理方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

①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刘德喜:《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主建设》,《新远见》2007年第12期、2008年第1期。

③俞可平:《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④平飞:《现代化与全球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国化的历史性超越,就在于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性、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提升中国的全球化境遇,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难题。

二、西方研究概况及学术范式转换

在西方“汉学”、“毛学”和“中国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认为是一个“最恼人的”(most vexing)又“最引人的”(most intriguing)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溯起,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迄今半个世纪了,代表性的学者有美国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迈斯纳(Maurice Meisn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沃马克(Brantly Womack)、华尔德(Andrew G. Walder)、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德里克·怀利,英国的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沃克尔(Rachel Walker),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Nick Knight)、格雷海姆·杨(Graham Young),德国的卜松山,韩国的宋荣培,以及华裔学者邹谠(Tang Tsou)、田辰山(Chenshan Tian)、刘康(Kang Liu)等。西方学者比较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英国的施拉姆说:邓小平等“当代的领导人正在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最初取得成功但在1949年之后没能进行下去的‘中国化’运动”^①。日本的大泽升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两个时代所干的事虽有不同,但两个人都强调‘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②。华裔学者田辰山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个时代政策的连续性(共通性)则是很清楚的。”^③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用数字概括为“一二三四”,即围绕一个主题,采取两种方法,涵盖三大问题,形成四种范式。一个主题,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施拉姆就提出:“我们不仅要问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而且要问二者如何结合。”邹谠看到,邓小平通

①张静、靳书君:《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本书使用的国外文献引文,除专门标注外,皆出自该文及拙作《西文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下同。

②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③[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过重新解释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保持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现在和以后要解决的是“协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与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① 怀利在 80 年代看到:“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正确的’关系的探求,成为 1927 年之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不同部分的总和”,而是“二者的完整结合”,其中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被中国(物质)所改变(限制),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方法,即文本解读和哲学透视两种主要方法。改革开放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红卫兵出版物、中国的报纸等文献资料。新时期以来,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资料数量和质量都远超过以往,中外学术交流和西方学者实地考察日益频繁,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来。受研究条件的影响,施拉姆、史华慈、魏斐德、沃马克、邹谠和早期的迈斯纳,都长于文本解读,施拉姆等还特别强调使用毛泽东“原版”著作,邹谠则仔细比对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的删改句段。70 年代末特别是“毛与马克思”专题论战后,斯塔尔、奈特、宋荣培、田辰山、德里克等纷纷从阅读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思维哲学、过程哲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一)研究的基本问题

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令人吃惊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囊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等基本问题,从学术上初步梳理了所“化”之义、与“化”之物和求“化”之途。

关于“化什么”,国外学者的观点有三种。(1)“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论”。怀利认为:“这个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观念性要素,革命科学(‘方法’)和欧洲以及俄国的民族形式(‘字母’)。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最初的民族形式被放弃,抽象的革命科学通过一种中国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2)“列宁主义革命意识论”。史华慈说:“‘民意’的观念会导致一种更为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化的观点,即认

^①Tang Tsou. “Review: 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 1984), p. 346.

为一般群众必须在一个代表普遍意志的自觉的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走向未来。”魏斐德认为:“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是先锋队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化。”宋荣培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继承它的邓小平思想)不断地号召要依靠‘人的意志’即‘不断的革命(或改革)实践’。笔者认为这里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弱点。”(3)“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论”。W·伊塞瑞克认为:尽管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斯大林模式仍然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迈斯纳则认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官僚制度化和精英上层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毛主义都与斯大林主义显著不同。但后毛时期邓小平的“非毛化”改革却带有“斯大林化”倾向。

关于“什么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同视角,有代表性的观点分述如下:(1)母语化(vernacularization),指语言文字的翻译,以及由于中西文化根本结构差异发生的词义转换。如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母语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至关重要。”奈特指出:“德里克所指母语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传统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从中得到的启发却彰显了母语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大意义。”(2)大众化(popularization),马克思主义通过通俗的民族形式和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所掌握。刘康说:“在德里克洞察到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母语化的基础上,我进一步观察到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心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审美观念:毛的方法基本上是用审美和艺术特征的民族形式装饰城市的、世界的、外国的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认真地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去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一种复杂的外来的意识形态”。施拉姆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包括使用普通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语言,用大众化的谚语和有声色的成语使之生动活泼,间或引经据典予以强调。”卜松山举例说:“毛泽东诗词极为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作者本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简而言之,他的诗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例证。”(3)民族化(nationalization),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情感、运动和目标结合起来,反映民族精神的诉求。费正清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中国人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施拉姆认为:“中国化在于使中国人易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仅是给它穿上中国话的衣服,而且把它和以往的观念和事变

联系起来。”德里克认为：“毛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换言之就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带上马克思主义风格，民族主义的目标被看成是阶级和阶级意识的革命要求。”（4）具体化（reification），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而产生战略策略和政策工具。奈特指出：“马克思主义若能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并有助于制定一种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既充分利用革命可能性，又顾及革命局限性的战略，方能对中国革命者有现实意义，并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指出，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作用，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田辰山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讲的是辩证法的科学，不是自由主义讲的工具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是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法，是通变！它在今天的具体化是‘科学发展观’。”（5）马克思主义化（marxification），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理论创新。怀利说：“创造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被描述为中国化。”^①德里克提出：“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内涵，也可以看作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化。”

关于“怎么化”，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形式。邹谠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四个环节：（1）调查研究；（2）具体情况具体分析；（3）制定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采取大胆行动；（4）把行动、政策、规划的方针及具体情况分析给予提升概括。奈特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两篇文章中，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包括四个步骤：（1）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并未提供什么现成的方案，可以自动地和必然正确地解决革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理论的作用，只是有助于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提供制定政策策略所需要的信息。（2）采取行动。认清了历史条件，革命者就可以在理论所阐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度内采取相宜的行动。这种行动只能说是相宜而未必正确，因为弄清历史条件，并不等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决定“正确”行动的公式。（3）评价矫正。要判断看来适当的行动是否正确，唯一的办法是在实践中考察其结果。若达到预期的结果，则证明该项行动和赖以采取行动的对历史条件的认识

①[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